



學生名稱：洪珊珊

學生編號：

就讀課程：中文教育四年制學士課程 (A4B037)

指導導師：馮志弘博士

畢業論文題目：朱熹的「蘇軾文學評論」及其文學觀

字數：7858

一、引言

宋代人才輩出，北宋的蘇軾和南宋的朱熹皆為具代表性的文學家及哲學家。朱熹是儒學集大成者、理學宗師，在我國思想史上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其文學成就亦不容漠視，對南宋以後的文學發展有很大影響。而蘇軾的文學造詣極高，影響後世深遠，其哲學思想亦自成一格，對宋代理學相當有影響。朱熹輯錄他書而成的《八朝名臣言行錄》完整具體地記述蘇軾的生平，當中選擇的材料毀譽參半，間接反映編者對所寫人物的評價。而朱熹對蘇軾其他方面的評論亦散見於其不同著作。本文透過分析朱熹如何評價蘇軾文學作品，探討其文學觀，指出：朱熹雖從理念上認為「文道」不可二分，但從他的「蘇軾文學評論」可見，在實際操作上他並不排除「稱譽蘇軾的『文』而否定他的『道』」的表述方式。這對深入研究蘇軾和朱熹的哲學思想有極大益處，有助考察南宋以後蘇軾的地位和發展，以及朱熹對南宋以後的文學發展之影響及文學與理學的關係。到現時為止，獨立研究蘇軾和朱熹的論文和專著已不勝枚舉，但將聯繫二人來研究的論文或專著卻相對較少。因此，本文探討的問題有其獨特價值。

二、前人研究綜述

過去百年以來，學術界對蘇軾的研究成果豐碩，主要側重於其文學成就的評價及事蹟的考證，關於其思想、政治作為的論著則相對較少¹；學者對朱熹的研究亦碩果累累，主要集中在其思想體系的發展及事蹟的考據，比較他與同時代思想家的論文也不在少數，關於其文學方面的論著相對較少²，而比較或涉及二人的則更為少見。有關二人的一手資料集中在《朱子

¹ 研究蘇軾的專著和論文亦不計其數。學者深入考據及評鑑蘇軾生平不同時期的生活和文學成就，還有其豐富而複雜的哲學思想，當中的文藝思想是大部分研究的重點。在深入探討蘇軾生平、文學成就及思想後，一些總結性的專著如雨後春筍相繼問世。曾棗莊(1984)《蘇軾評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富文學性的手法細膩描繪一代文豪蘇軾在生平不同時期的各種事跡，生動展現蘇軾一生的全貌，有助了解其人生的起伏。而王水照(2004)《蘇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則重點考察造就文化巨人蘇軾的社會背景及其哲學、史學、美學思想及文藝成就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綜觀近幾十年關於蘇軾的研究成果，着墨最多的是蘇軾的文學觀和其在文學史上的價值與影響；較少著作論及蘇軾所代表的蜀學流派的學術思想內涵。

² 研究朱熹思想的著作很多，如張立文(2001)《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粟品孝(1998)《朱熹與宋代蜀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及王懋竑(1998)《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的研究成果，對理解朱熹的思想有積極的參考和借鑒作用。《朱熹思想研究》是研究朱熹哲學思想的專著，其優點在於先介紹朱熹生

全書》³、《三蘇全書》⁴，直接與本文主題相關的研究包括：徐榴(2011)的《朱熹眼中的蘇軾》⁵，指朱熹以褒貶不一的態度評價蘇軾的文章，既承認其文章的高明，又不忘指出其疏漏之處，但尚未探討朱熹「蘇軾文學批評」的出發點及展現的文學觀。楊藝馨(2011)的《朱熹北宋文學批評之研究》⁶論及朱熹對蘇軾文學作品的批評，既讚賞蘇軾文學作品的藝術表現，又嚴厲指責其文章內容，但亦未分析朱熹「蘇軾文學批評」的出發點及展現的文學觀。賈驕陽(2014)的《南宋文話對蘇軾散文的批評》⁷研究南宋文話對蘇軾散文的評價及分析背後成因，並論述朱熹非議蘇軾散文的原因，但當中的分析有欠準確。故本文的重點為研究朱熹「蘇軾文學批評」的出發點及展現的文學觀。

三、朱熹對蘇軾文學作品之評價

朱熹對蘇軾文學作品的讚賞多出自「文」的角度，如文辭華妙明白、文勢雄健宏闊、議論近事、氣豪且有骨節；而批評則多出自「道」的角度，如其思想礙理害道。可見朱熹雖從理念上認為「文道」不可二分，但在實際操作上他並不排除「稱譽蘇軾的『文』而否定他的『道』」的表述方式。

一、文辭華妙明白

朱熹主要從兩大角度稱許蘇軾文學作品的文辭：偉麗華艷和淺白易懂。文辭偉麗華艷方

活的時代、身世和經歷，再從不同角度論述及深入探討朱熹的哲學觀，如經濟、政治、美學、歷史及教育等，其中討論朱熹美學思想的一章，談及朱熹對美與善、文與道、詩與理的文學審美觀念，這是他評價蘇軾文學作品的根據，對本文的寫作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朱熹與宋代蜀學》則講述宋初時四川地區出現的獨立學術流派——蜀學，「三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蜀學興起與理學發展有密切關係，而儒學集大成者朱熹建構其思想體系框架時，邊批判蜀學的糟粕，邊吸收其精髓，當中關於朱熹批評和吸取蘇氏蜀學的章節，反映他與蘇軾在哲學思想上的異同，這些分歧正是朱熹評論蘇軾文學作品的關鍵，對本文的撰寫有很大的啟發和幫助，因為文學作品往往是作者思想的呈現。《朱熹年譜》則詳細記錄朱熹的生平和思想發展，按照時間順序還原朱熹的一生，從出生到發展成為理學大家，透過了解朱熹的經歷，有助理解及掌握其學術思想。

³ 朱熹(2010)：《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⁴ 蘇軾等(2001)：《三蘇全書》，北京：語文出版社。

⁵ 徐榴(2011)：《朱熹眼中的蘇軾》，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未出版。

⁶ 楊藝馨(2011)：《朱熹北宋文學批評之研究》，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⁷ 賈驕陽(2014)：《南宋文話對蘇軾散文的批評》，山西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面，朱熹曾提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⁸，直言蘇軾用字壯美，近代無人可與之匹敵，如想寫作，可以其文為榜樣，努力學習。又如「東坡則華艷處多」⁹，指出蘇軾文章中較多運用華艷美麗的文字，藝術表現出色；「只是它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¹⁰，明言蘇軾文學作品的優美辭令甚至可以掩蓋當中的漏洞，使之不至洩露於人前。

而文字淺白易懂方面，他提及「東坡文字明快」¹¹，讚賞蘇軾的文字明白通暢、不晦澀呆板；又在被學生問及：「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時回應：「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¹²，對於蘇轍所寫文章是否比蘇軾更近乎情理的問題，在比較兩者的文字後，直指蘇軾的文字在論說利害時，更為清晰明確，這是蘇轍比不上的。又如「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個難字，而文章如此好」¹³，認同曾鞏、歐陽修及蘇軾寫的同為好文章，而歐陽修及蘇軾之文不用艱深晦澀的字尤其出色；「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那尋常底字」¹⁴，強調歐陽修和三蘇之文的好在於說理時運用的文字淺白易懂，不會求新而以奇怪字取代普通字。可見朱熹肯定蘇軾文學作品的文辭。

二、文勢雄健宏闊

朱熹亦肯定蘇軾文學作品的文勢雄健宏闊。如「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

⁸ 朱熹(2010)：〈答程允夫〉，《朱子全書》第22冊，頁1864。按：寫於紹興三十年庚辰(1160)，時朱熹三十一歲，陳來(2007)：《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20。

⁹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8。按：沈澗所記，錄於慶元四年戊午(1198)以後，時朱熹約七十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8。

¹⁰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14。按：沈澗所記，錄於慶元四年戊午(1198)以後，時朱熹約七十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8。

¹¹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299。按：楊道夫所記，錄於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以後，時朱熹約六十一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7。

¹²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7。按：葉賀孫所記，錄於紹熙二年辛亥(1191)以後，時朱熹約六十三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6。

¹³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17-4318。按：包揚所記，錄於淳熙十年癸卯(1183)、淳熙十一年甲辰(1184)、淳熙十二年乙巳(1185)，時朱熹五十四至五十六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50。

¹⁴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2。按：李儒用所記，錄於慶元五年己未(1199)，時朱熹七十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8。

裡面自有法」¹⁵，稱許其作品氣勢雄壯遼闊，且變化激烈詭奇，猶如波濤翻騰，讀的人難以仿效，因蘇軾自講求一套獨特的寫作形式和技巧。「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¹⁶表達相似觀點：蘇文氣勢強勁有力，只可惜細讀之下會發現當中有虛浮之處。「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點檢」¹⁷，再次強調蘇文只是整體氣勢不俗，卻經不起逐字細讀，否則定會發現當中的錯漏。

晚年的朱熹在病中讀《蘇軾集》時，憶及父親曾抄寫蘇軾的《昆陽賦》向自己講授古今成敗興亡大致，並評道「子瞻作此賦時，方二十一二歲耳，筆力豪壯，不減司馬相如也」¹⁸，朱熹認同父親的看法，《昆陽賦》氣勢豪放雄壯，甚至不次於賦之聖者司馬相如。這是極大的稱譽。又如朱熹曾以「《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批評蘇軾二碑的內容沒有任何意義，但當門人指「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從「道」的角度看二碑並沒有可取之處；從「文」的角度看二碑氣勢雄健，朱熹曰：「然」¹⁹，認同二碑氣勢可取。可見朱熹肯定蘇軾文學作品的文勢。

三、議論近事亦譎

朱熹在蘇軾眾多文學作品中最欣賞其議論文，曾提到「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²⁰，稱讚蘇軾是天才型的文學家，其議論文詞有過人之處；在談論東坡之學時，朱

¹⁵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18。按：包揚所記，錄於淳熙十年癸卯(1183)、淳熙十一年甲辰(1184)、淳熙十二年乙巳(1185)，時朱熹五十四至五十六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50。

¹⁶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5。按：楊道夫所記，錄於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以後，時朱熹約六十一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7。

¹⁷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5。按：黃義剛所記，錄於紹熙四年癸丑(1193)以後，時朱熹約六十四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7。

¹⁸ 朱熹(2010)：〈跋韋齋書昆陽賦〉，《朱子全書》第25冊，頁4794。按：原文「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於今忽忽五十有九年矣……」，時朱熹七十歲。

¹⁹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4。按：包揚所記，錄於淳熙十年癸卯(1183)、淳熙十一年甲辰(1184)、淳熙十二年乙巳(1185)，時朱熹五十四至五十六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50。

²⁰ 朱熹(2010)：〈本朝四〉，《朱子全書》第18冊，頁4055。按：錢木之所記，錄於慶元三年丁巳(1197)，時朱熹六十八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8。

熹曰：「今東坡經解雖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處」²¹，表達與前引文類似的觀點：蘇軾的經書注釋雖不符純正的儒學，但亦有不少優點，其議論亦然。又如「讀蘇氏書，愛其議論不為空言，竊敬慕焉。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譎矣」²²，直言讀蘇軾文學作品時，喜愛其議論文從不寫空泛而不切實際的言論，他對此尊敬而仰慕；又指其議論文所言非虛、接近道理，讓讀的人喜歡。而所謂「譎」指怪異和欺詐，參考朱熹批評「東坡平時為文論利害，如主意在那一邊利處，只管說那利。其間有害處，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說，欲其說之必行」²³，蘇軾議論時為增加說服力，只述說有利自己立場的論點和論據，刻意隱藏不利自己立場的論點和論據，可見蘇文的怪異之處在於其欺詐。故朱熹雖肯定蘇軾議論文的切實但否定其偏頗。

四、氣豪且有骨節

前人研究普遍認為：朱熹以作家的人品為評論其文學作品的根據，認為作家的「道」決定「文」的高低。如王哲平(2000)²⁴和馬茂軍(2001)²⁵同指朱熹持「知人論世」、「文如其人」說，認為作家修養直接決定文學作品成敗；田恩銘(2005)²⁶綜合朱熹的唐詩批評，指出其對文人品格要求嚴格，認為優秀詩人必須正身養性。又如郭紹虞(1967)²⁷、顧易生等(1989)²⁸、張毅(1995)²⁹、莫礪鋒(2000)³⁰、張少康(2005)³¹綜合朱熹的文學批評，同指朱熹既是論文亦是論人；明道者始能寫出好文章；強調道德人格修養對作家創作的重要；認為作家人格決定其文品，若作家人

²¹ 朱熹(2010)：〈本朝四〉，《朱子全書》第18冊，頁4062。按：包揚所記，錄於淳熙十年癸卯(1183)、淳熙十一年甲辰(1184)、淳熙十二年乙巳(1185)，時朱熹五十四至五十六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50。

²² 朱熹(2010)：〈答程允夫洵〉，《朱子全書》第22冊，頁1859。按：寫於紹興三十年庚辰(1160)，時朱熹三十一歲，陳來(2007)：《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20。

²³ 朱熹(2010)：〈本朝四〉，《朱子全書》第18冊，頁4055。按：陳淳所記，錄於紹熙元年庚戌(1190)、慶元五年己未(1199)，時朱熹六十一歲、七十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50。

²⁴ 王哲平(2000)：〈朱熹文學思想倫略〉，《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31(3)，頁97-102。

²⁵ 馬茂軍(2001)：〈朱熹的散文思想〉，《安康學院學報》，23(3)，頁1-9。

²⁶ 田恩銘(2005)：〈論朱熹的唐詩批評〉，《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報(西安)》，22(2)，頁63-65。

²⁷ 郭紹虞(1967)：《中國文學批評史》，香港：宏智書店，頁200-207。

²⁸ 顧易生、蔣凡和劉明今(1989)：《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762-787。

²⁹ 張毅(1995)：《宋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頁237-256。

³⁰ 莫礪鋒(2000)：《朱熹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189-208。

³¹ 張少康(2005)：《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52-60。

格差強人意，其作品亦毫無價值可言；詩歌創作需要作者很高的主體修養。

而理論上，朱熹對蘇軾文學作品的欣賞引證他對蘇軾人格的肯定。如「東坡善議論，有氣節」³²，讚賞蘇軾擅長寫作議論文，為人堅持自我，才德兼備。又如「前輩文章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上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³³，稱許前輩歐陽修、蘇軾的文章展現其氣概風骨，故其文豪放，因他們曾努力鑽研經書；對比今人寫作，只顧形式上的文字修飾，猶如耍雜戲，內容空洞。朱熹曾提及「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³⁴，雖否定蘇軾議論文的偏頗但肯定其才學、德行卓越。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亦嚴厲抨擊蘇軾的人品。如「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舉，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陽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論事實則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銜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為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荊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³⁵，朱熹否定蘇軾的學術思想、品性德行、政治態度，指他的品行不如王安石，為人功利，解經所展現的思想夾雜佛老之說，未能準確理解儒學，

³² 朱熹(2010)：〈本朝四〉，《朱子全書》第18冊，頁4054。按：楊若海所記，不知何時所錄，故不知朱熹當時歲數，〈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8。

³³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13。按：李方子所記，錄於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以後，時朱熹約六十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6。

³⁴ 朱熹(2010)：〈論語十七·泰伯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朱子全書》第15冊，頁1288。按：徐寓所記，錄於紹熙元年庚戌(1190)以後，時朱熹約六十二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7。

³⁵ 朱熹(2010)：〈答汪尚書七月十七日〉，《朱子全書》第21冊，頁1300-1301。按：寫於乾道四年戊子(1168)，時朱熹三十九歲，陳來(2007)：《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48。

且與貪官蔡京相似，只是沒有擅權亂政的機會。又如朱熹被後輩問及「荊公與坡公之學」時回應：「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裡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³⁶，同指蘇軾和王安石的學術思想不純正，且蘇軾的品性德行不如王安石。按此思路，朱熹本應否定蘇軾的文學作品，卻仍肯定其作品的藝術表現，可見朱熹雖從理念上認為作家的「道」決定「文」的高低，但在實際操作上他並不排除「稱譽蘇軾的『文』而否定他的『道』」的表述方式。

五、輕文字致巧漏

朱熹認為蘇軾文學作品亦有其缺點：「輕文字」、「不免疏漏」、「傷於巧」，即文字有欠精煉、內容有欠嚴密、過於着重形式。如「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個字便是合當下一個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³⁷，指出蘇軾佩服范淳夫用字精煉，文中每字用得恰到好處；而蘇軾用字不夠精煉；他寫作時從不預先想好大綱，直接下筆就寫，後覺字數不足就再接着寫。朱熹批評這種做法導致其文內容不夠嚴密。如「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疏漏處」³⁸，直言蘇軾雖才華洋溢、擅長寫作文章，但其內容亦有疏忽遺漏之處。朱熹與學生討論《溫公神道碑》，被問及：「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時回應：「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說：「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卻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卻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³⁹，表示蘇軾下筆寫此文時並沒想過如何鋪排；蘇文的內容不如韓愈、曾鞏費心鋪排的文章嚴密，彷彿一段中欠缺數句，一句中欠缺數字，意思有欠完整。

³⁶ 朱熹(2010)：〈本朝四〉，《朱子全書》第18冊，頁4039。按：楊道夫所記，錄於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以後，時朱熹約六十一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7。

³⁷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7。按：甘節所記，錄於紹熙四年癸丑(1193)以後，時朱熹約六十五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7。

³⁸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15。按：余大雅所記，錄於淳熙五年戊戌(1178)以後，時朱熹約五十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6。

³⁹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5-4306。按：楊道夫所記，錄於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以後，時朱熹約六十一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7。

另如「《論語說》亦然有好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來」⁴⁰、「東坡《歐陽公文集敘》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卻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相如」⁴¹，以《論語說》中間的破綻、《歐陽公文集敘》的首尾不相應，力證蘇文內容不夠嚴密、意思不夠完整。對此，蘇軾亦自評道：「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⁴²，透露自己寫作時思如泉湧，故只能跟隨思路寫下文字，難免在細微處出錯。

至於蘇文過於着重形式，是對比曾鞏文而言，如「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⁴³、「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⁴⁴，直言蘇文過於巧妙、華美，甚至議論亦有不合理之處。朱熹被學生問及：「南豐文如何？」時回應：「南豐文卻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卻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⁴⁵，可見他比起蘇文的優美，更喜歡曾鞏文的樸實自然而合理。

六、說盡並無餘意

朱熹認為表達有欠含蓄亦是蘇軾文學作品的短處之一。如「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⁴⁶，指出蘇文和曾鞏文說理充分，不留餘意。而「蘇、

⁴⁰ 朱熹(2010)：〈本朝四〉，《朱子全書》第18冊，頁4055。按：錢木之所記，錄於慶元三年丁巳(1197)，時朱熹六十八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8。

⁴¹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5。按：葉賀孫所記，錄於紹熙二年辛亥(1191)以後，時朱熹約六十三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6。

⁴² 蘇軾等(2001)：〈自評文〉，《三蘇全書》第13冊，頁505。

⁴³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0。按：楊道夫所記，錄於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以後，時朱熹約六十一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7。

⁴⁴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2。按：輔廣所記，錄於紹熙五年甲寅(1194)以後，時朱熹約六十六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6。

⁴⁵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8。按：沈憫所記，錄於慶元四年戊午(1198)以後，時朱熹約七十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8。

⁴⁶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4。按：包揚所記，錄於淳熙十年癸卯(1183)、淳熙十一年甲辰(1184)、淳熙十二年乙巳(1185)，時朱熹五十四至五十六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50。

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⁴⁷，批評蘇詩言盡意盡而無餘韻；黃庭堅詩則費心鋪排而失自然。聯繫「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⁴⁸、「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⁴⁹，朱熹稱讚歐陽修文章意未盡、耐人尋味；《六一居士傳》曲折婉轉、值得玩味，可見他較喜歡含蓄、餘韻不絕的文學作品。

七、思想礙理害道

朱熹猛烈抨擊蘇軾及其文學作品的思想不純正、礙理害道。如「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放裏面，此是它大病處。只是它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⁵⁰，強調「道」是「文」的基礎，「文」是「道」從屬，二者為一；批評蘇軾說自己的「文」必定與「道」一起，分裂「文」、「道」，寫作時才把「道」放進「文」，並以華美的言辭掩飾，故蘇文錯在最主要的基本部分。據莫礪鋒(2000)概括，朱熹的「文道」觀可分為四個層次，「文道」是具多種涵義的複雜概念。⁵¹而上述的「道」指文章的思想內容，「文」指文章的藝術形式，被喻為樹木的「根本」和「枝葉」。對樹木而言，二者缺一不可；就如文章，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亦是缺一不可。朱熹認為蘇軾夾雜佛老的思想不純正，故猛烈抨擊，如「今東坡經解雖

⁴⁷ 朱熹(2010)：〈論文下詩〉，《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21。按：廖德明所記，錄於乾道九年癸巳(1173)以後，時朱熹約四十五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6。

⁴⁸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4。

⁴⁹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01。

⁵⁰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14。按：沈澗所記，錄於慶元四年戊午(1198)以後，時朱熹約七十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8。

⁵¹ 第一個層次：「道」指永世長存的「天道」，「文」指典章制度；第二個層次：「道」指儒家的學說，「文」指一切文化學術(包括「射」、「御」等技藝)；第三個層次：「道」指人倫秩序，「文」指「文字」；第四個層次：「道」指文章的思想內容，「文」指文章亦即文學的形式(比較接近古文家的同類概念)。莫礪鋒(2000)：《朱熹文學研究》，頁109-116。

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處。但他只從尾梢處學，所以只能如此」⁵²，指出蘇軾解經所展現的思想並非純正的儒家思想，因其學問得自末端，未能準確理解儒學，故蘇文在思想內容上有缺失，未能達至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兼備。

正因蘇軾思想不純正，其文卻盛行於世，故朱熹直言「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⁵³，蘇文對儒家正道的損害甚至比佛老思想嚴重，因其表現的不純思想易使人讀後喪失本性，久之沉迷不悟。又如「因論東坡《刑賞論》『悉舉而歸之仁義』，如是則仁義乃是不得已而行之物，只是作得一癡忠厚。此說最礙理，學者所當察」⁵⁴，意思與前引文類近：蘇文礙理。張立文(1994)⁵⁵、莫礪峰(2000)⁵⁶綜合朱熹的理學思想，指出其眼中的「道」和「理」是同一概念：既具有「形而上」的屬性，亦相對於「形而下」的「器」。故礙理和害道乃同一意思。

概括而言，朱熹從「文」的角度肯定蘇軾文學作品的藝術形式，如文辭華妙明白、文勢雄健宏闊、議論近事、氣豪且有骨節；而從「道」的角度批評其思想礙理害道。可見朱熹雖從理念上認為「文道」不可二分，但在實際操作上他並不排除「稱譽蘇軾的『文』」而否定他的『道』」的表述方式。

四、朱熹「蘇軾文學評論」展現的文學觀

上述的朱熹「蘇軾文學評論」展現其有別於其他理學家的獨特文學觀。朱熹繼承周敦頤、

⁵² 朱熹(2010)：〈本朝四〉，《朱子全書》第18冊，頁4062。按：包揚所記，錄於淳熙十年癸卯(1183)、淳熙十一年甲辰(1184)、淳熙十二年乙巳(1185)，時朱熹五十四至五十六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50。

⁵³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298。按：郭友仁所記，錄於慶元四年戊午(1198)，時朱熹六十九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8。

⁵⁴ 朱熹(2010)：〈本朝四〉，《朱子全書》第18冊，頁4055。按：鄭可學所記，錄於紹熙二年辛亥(1191)，時朱熹六十二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9。

⁵⁵ 張立文(2001)：《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27-158。

⁵⁶ 莫礪鋒(2000)：《朱熹文學研究》，頁109-113。

二程的儒學⁵⁷，但其文學觀卻與三者截然不同。周敦頤主張文以載道，認為「文」的任務是載「道」，表示：「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矣」⁵⁸，將道德視為文辭的內容，就將文的地位由藝術形式降為道德展現的工具。對文道關係，周敦頤的文道觀注重以「文」提升人的道德境界，有明顯重道輕文的傾向；二程更進一步提出「作文害道、理本文末」⁵⁹，強調儒家道統，極為輕視詩文，認為詩文於道有害，甚至認為作文是玩物喪志，否定文的獨立藝術價值。郭紹虞(2000)研究中國文學史的文與道問題，指出：文學家之論文至三蘇趨於極端；道學家之論文至二程趨於極端。⁶⁰

相對於二程，朱熹的特色尤其在於調和兩者「文」、「道」的概念衝突，主張「文道合一」。這個觀念體現在他的「蘇軾評論」上，即可見出他對蘇軾文學作品的評價是「銜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⁶¹。朱熹認為文章應從「道」中自然流出，「文」即是「道」，「道」先於「文」；「道」為本，「文」為末。故他認定蘇軾之誤在於「文自文、道自道」，這把「道」與「文」撕裂為二物，且為文先於體道，是為大錯。而且，在朱熹眼中，蘇軾為文「上談性命，下述政理」，挾道而行，危害正道及後世人心。故朱熹在「道無二道」的大前提下堅決反對蘇軾之「文自文、道自道」。正如張立文(2001)所言：朱熹美學理論的要旨是文道統一。⁶²而蘇軾以文貫道，即道依文而存在，道由文定，便是本末倒置。可見朱熹在評論文學作品時，追求道德思想內容及文藝形式美感並重，最終目標是道與文的合一。然而，這只是朱熹的文學理念，在實際操作上他並不排除「稱譽蘇軾的『文』而否定他的『道』」的表述方式。

⁵⁷ 朱熹：「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顧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朱子全書》第24冊，頁3732；又云：「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滄洲精舍告先聖文〉，《朱子全書》第24冊，頁4050。

⁵⁸ 周敦頤(2002)：〈文辭第二十八〉，《周敦頤集》，長沙：岳麓書社，頁46。

⁵⁹ 程顥、程頤(1981)：〈答朱長文書〉，《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頁600-601。

⁶⁰ 郭紹虞(2000)：《郭紹虞說文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79。

⁶¹ 朱熹(2010)：〈答程允夫洵〉，《朱子全書》第22冊，頁1859。按：寫於紹興三十年庚辰(1160)，時朱熹三十一歲，陳來(2007)：《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20。

⁶² 張立文(2001)：《朱熹思想研究》，頁364-372。

上述的朱熹「蘇軾文學評論」從「文」的角度肯定蘇軾文學作品的藝術表現，如文辭華妙明白、文勢雄健宏闊、議論近事、氣豪且有骨節。可見在實際操作上朱熹並不排除「稱譽蘇軾的『文』而否定他的『道』」的表述方式。而在實際操作上，朱熹對文學作品的藝術形式有以下期望：文辭偉麗華艷、淺白易懂；文勢雄健宏闊；議論近事切實；文字精煉、內容嚴密；含蓄、餘韻不絕。朱熹認為文章應以達意明理為前提，內容充實，反對只顧形式以致內容空虛的不良傾向。如「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⁶³，朱熹稱許蘇軾寫的遊記內容充實，所謂「實」並不局限於「道」或「理」，而是泛指記敘、議論等方面有充實的內容。可見朱熹在欣賞文學作品時，並不在意作品是否直接與儒道、性理有關，反而傾向肯定文章的藝術表現。

在藝術形式上，朱熹推崇淺白易懂的文學作品。如「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⁶⁴，批評今人寫作只專注於減省字句、改換新奇陌生的詞語，以致說理不清、艱澀難明；主張為文應如聖人所作經典般淺白易懂，因立言目的在於使人明白以宣揚道理；稱許前輩歐陽修、蘇軾作文能做到平易通達，宛如聖人之言。這與周敦頤、二程的文學觀大相徑庭，源於朱熹對文學本質的認知。朱熹強調文學作品的抒情本質，認為文學創作乃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如被問及：「詩何為而作」時回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⁶⁵，表示人的天性本是靜，會被外物觸動，因而感嘆，故文學創作源於人的情感觸動。又如「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⁶⁶，表達人在明白道理不斷實踐後，文學創作可助明心見性；「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

⁶³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15。

⁶⁴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13。

⁶⁵ 朱熹(2010)：〈詩集傳序〉，《朱子全書》第1冊，頁350。

⁶⁶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14。

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真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⁶⁷，認為好詩是創作者的真情流露，而非閒時耗用精神去思考的詩句。可見朱熹肯定文學創作的必要和合理，有別於二程的「作文害道」。

前人的朱熹文學批評研究從朱熹的哲學主張和理學傾向出發，肯定朱熹的文學修養，承認他是理學家中最懂文學的人，對其文學思想關注不足，說朱熹視文章為小技，否定文學的社會作用與自身價值⁶⁸；主張文從道出，否定文學的獨立地位⁶⁹；認為有德者必有言，以窮理代替作詩作文，否定文學自身的審美要素和情感特徵⁷⁰。如成復旺(2010)認為：道學家的文學理論違背文學的客觀規律，阻礙文學的健康發展。⁷¹以上朱熹重道輕文的觀點較為片面，除此之外，通過朱熹的「蘇軾文學評論」還能看到朱熹雖強調「文道」在理念上不可二分，但他並不排除在實際操作上「稱譽作者的『文』而否定其『道』」的表述方式。

其次，顧易生等(1989)⁷²、張少康(2005)⁷³認為朱熹文學思想中有重文的一面，開始研究其主張的文學合理性。如張少康(2005)認為：南宋道學家的文學思想比北宋前期的道學家之文學思想有所進步，不再對文學採貶斥和否定態度，注意到文學本身的特徵，這體現在朱熹的文學思想：文學非可有可無，並注意文的藝術性和如何寫好文的方法。⁷⁴又如張毅(1995)認為：朱熹的文道觀與其理學思想相一致，主張文源於道，道是根本；抽象的道必須表現在舉體的文，而文章感染力可助發揮道德教化的作用，言而無文，行而不遠。⁷⁵以上朱熹重道又重文的觀點固然較合理，如果結合朱熹的「蘇軾文學評論」，尚能發現朱熹只是從理念上認為「文道」不可二分，但在實際操作上他也會稱譽作者的「文」而否定其「道」。

另外，賈驕陽(2014)在《南宋文話對蘇軾散文的批評》指出朱熹非議蘇軾散文的直接原因是書院教育時，提及：「朱熹前期對蘇軾及其作品欣賞有加，後期卻橫眉冷目，批判指責」。⁷⁶

⁶⁷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32。

⁶⁸ 郭紹虞(1967)：《中國文學批評史》，頁200-207。

⁶⁹ 周予同(1929)：《朱熹》，上海：商務印書館，頁79-84。

⁷⁰ 羅根澤(1970)：《中國文學批評史》，香港：典文出版社，頁710-719。

⁷¹ 成復旺(2010)：《新編中國文學理論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219-222。

⁷² 顧易生、蔣凡和劉明今(1989)：《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下》，頁762-787。

⁷³ 張少康(2005)：《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頁52-60。

⁷⁴ 張少康(2005)：《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頁52-60。

⁷⁵ 張毅(1995)：《宋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頁237-256。

⁷⁶ 賈驕陽(2014)：《南宋文話對蘇軾散文的批評》，山西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頁41-47。

這分析有欠準確，參考上述的朱熹「蘇軾文學評論」，發現他對蘇軾作品的欣賞並未有隨時間而明顯變化，比如朱熹在三十一歲時讚揚「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⁷⁷，蘇軾用字壯美，近代無人可與之匹敵，如想寫作，可以其文為榜樣，努力學習；又在五十四至五十六歲時讚賞「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個難字，而文章如此好」⁷⁸，曾鞏、歐陽修及蘇軾寫的同為好文章，而歐陽修及蘇軾之文不用艱深晦澀的字尤其出色；更在六十八歲時讚許「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⁷⁹，蘇軾是天才型的文學家，其議論文詞有過人之處。可見賈驕陽⁸⁰的分析有欠準確，朱熹對蘇軾作品的欣賞和批評並未有隨時間而明顯變化。

五、結論

本文透過分析朱熹如何評價蘇軾文學作品，探討其文學觀，指出：一、朱熹從「文」的角度肯定蘇軾文學作品的藝術形式，如文辭華妙明白、文勢雄健宏闊、議論近事、氣豪且有骨節；而從「道」的角度批評其思想礙理害道；二、朱熹雖從理念上認為「文道」不可二分，但從他的「蘇軾文學評論」可見，在實際操作上他並不排除「稱譽蘇軾的『文』而否定他的『道』」的表述方式。

⁷⁷ 朱熹(2010)：〈答程允夫〉，《朱子全書》第22冊，頁1864。按：寫於紹興三十年庚辰(1160)，時朱熹三十一歲，陳來(2007)：《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20。

⁷⁸ 朱熹(2010)：〈論文上〉，《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17-4318。按：包揚所記，錄於淳熙十年癸卯(1183)、淳熙十一年甲辰(1184)、淳熙十二年乙巳(1185)，時朱熹五十四至五十六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50。

⁷⁹ 朱熹(2010)：〈本朝四〉，《朱子全書》第18冊，頁4055。按：錢木之所記，錄於慶元三年丁巳(1197)，時朱熹六十八歲，〈朱子語類姓氏〉，《朱子全書》第18冊，頁4348。

⁸⁰ 賈驕陽(2014)：《南宋文話對蘇軾散文的批評》，山西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頁41-47。

參考資料

一、專書

1. 莫礪鋒(2000)：《朱熹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 王水照(1984)：《蘇軾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 朱熹(2010)：《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 蘇軾等(2001)：《三蘇全書》，北京：語文出版社。
5. 張立文(2001)：《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6. 粟品孝(1998)：《朱熹與宋代蜀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7. 王懋竑(1998)：《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
8. 曾棗莊(1984)：《蘇軾評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9. 王水照(2004)：《蘇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0. 周敦頤(2002)：《周敦頤集》，長沙：岳麓書社。
11. 程顥、程頤(1981)：《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
12. 郭紹虞(1967)：《中國文學批評史》，香港：宏智書店。
13. 郭紹虞(2000)：《郭紹虞說文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4. 張毅(1995)：《宋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
15. 張少康(2005)：《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6. 顧易生、蔣凡和劉明今(1989)：《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7. 周予同(1929)：《朱熹》，上海：商務印書館。
18. 羅根澤(1970)：《中國文學批評史》，香港：典文出版社。
19. 成復旺(2010)：《新編中國文學理論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 陳來(2007)：《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二、論文

1. 徐榴(2011)：《朱熹眼中的蘇軾》，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未出版。

2. 楊藝馨(2011)：《朱熹北宋文學批評之研究》，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3. 賈驕陽(2014)：《南宋文話對蘇軾散文的批評》，山西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4. 王哲平(2000)：〈朱熹文學思想倫略〉，《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31(3)，頁 97-102。
5. 馬茂軍(2001)：〈朱熹的散文思想〉，《安康學院學報》，23(3)，頁 1-9。
6. 田恩銘(2005)：〈論朱熹的唐詩批評〉，《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報(西安)》，22(2)，頁 63-65。